■ 史海钩沉

孔子嫡传后人为何在衢州——

孔氏大宗南渡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2011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2年纪念日。在孔子故里曲阜，辛卯年公祭孔子大典在曲阜孔庙举行；同时，一场“学祭”典礼在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举行。今年5月，以“当代人祭孔”和“百姓祭孔”为特色的南孔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世人皆知，孔子的家庙在曲阜，在衢州怎么也有孔氏家庙？在“学祭”典礼举行之际，记者赶赴这座有着1800年历史的江南重镇，走近存有宋时规制的孔氏南宗家庙，聆听6岁袭任“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的孔子第75世嫡长孙孔祥楷讲述那段被湮没的历史……

衢州孔氏家庙大门 舒成通 摄

衢州孔氏家庙孔子像

孔子夫妇楷木像

孔子嫡长孙奉诏南渡陪祭

自唐太宗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下诏“州县以下皆立孔庙”开始，我国历史上先后有上千座孔庙。而孔氏家庙是孔子嫡传宗子率族人祭祀孔子的地方，整个中国只有两座：一座在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另一座就在浙江衢州。

清朝兵部尚书李之芳《清康熙衢州重修孔氏家庙碑》云：“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唯曲阜衢州耳。”但是，孔子后人为什么在衢州建立南宗家庙？这就要从孔氏大宗南渡说起。

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女真族迅速崛起，与北宋联合灭辽后，窥宋虚弱，挥兵南下。北宋政权内部战和不定，终在公元1127年酿靖康大耻，宋徽宗、宋钦宗被俘，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员和机要大臣、宫廷女官乃至厨师等都被金人俘虏北上；而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被外派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成为皇室唯一幸存的人。

在大臣们推举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赵构便是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秋，宋高宗为躲避金兵，把行宫转移到扬州，“诏东京所属官吏，奉祀器、大乐、仪仗、法物”，在扬州东南筑坛，开始准备冬至郊祀。

据《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记载说，建炎二年，宋高宗赵构在扬州祭天，孔子第48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奉诏陪祭。而早在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26岁的孔端友就被授为朝奉郎、直秘阁、袭封衍圣公。在叔父孔传的支持下，他命胞弟孔端操和部分族人留守阙里，自己与孔传率领宗室成员于11月抵达扬州，参加冬至郊祀。

扬州郊祀后，孔端友和叔父孔传回到曲阜。当年12月，金兵侵东平、下济南，经孔氏族人商议，除留孔端友胞弟孔端操、侄孔璠留守阙里陵庙外，孔端友毅然率领百余近支族人，于“金人陷袭庆(今山东兖州)”前南下，避寇扬州。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2月，金军攻破楚州后直逼扬州，宋高宗仓惶逃往杭州，孔端友偕孔传等百余近支族人随后到达。宋高宗为“回天下之心”，处理南渡的文武百官、皇室巨族的善后事宜，令“百官入见”。孔端友率部分族人前往朝拜，上疏叙述孔氏家门旧典及离祖丧家之苦。宋高宗感激“护驾南渡”的忠诚和奉像南渡的功德，于是颁旨，赐家衢州。

靖康之变、曲阜中衰，而南渡后的这支孔氏族人就在衢州住下来了，衢州也就成了孔子后裔的第二故乡，史称“东南阙里”。

忽必烈赞“真圣人之后也”

在孔子后裔安家衢州之后，与南宋政权对峙的金朝皇帝金熙宗封孔端友留守之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主持曲阜祀事。自此，孔子世家内形成了两个宗子、两个衍圣公的局面。

据介绍，孔氏南宗先后经历孔端友、孔玠、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六代衍圣公。不过，在元大一统后，元世祖忽必烈欲以思想的统一巩固其政治统一。北宗衍圣公孔浈因“冒姓而夺爵”，朝廷历经廷议，确认“寓衢者乃其宗子”。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南宗孔子第53代嫡长孙孔洙奉诏入觐，元世祖令其载爵回故里曲阜承祀。孔洙向元世祖面陈两难心境。他说，衢州已有5代坟墓，若遵皇上诏令北迁，自己实不忍离弃先祖的坟墓；若不离弃先祖坟墓，又将有违圣意。孔洙表示，母老乞南还，愿将自己的衍圣公爵位让给他在曲阜的族弟孔治世袭。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孔洙让爵”。元世祖忽必烈盛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这样，由于衢州孔氏南宗的礼让，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曲阜孔治获得“衍圣公”世袭爵位。正宗由此罢封，而南北复归统一。

南宗“公爵”虽让，但孔子之道始终未违。他们也以此为契机，坚定地走向民间，致力于平民教育，或为学官，或为山长，前后相望，为“儒学南渐、理学北传”作出了贡献。

明弘治末年，衢州知府沈杰缘于“南渡”、“让爵”等史实，疏请援例复爵。明廷遂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诰授孔子59世宗子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享受衍圣公次子之待遇。而在“德让”风范的激励下，南宗先后承袭的十五世翰林博士及三任奉祀官，仍继续弘扬孔子之道。明清统治者，亦于南宗的“典礼”，逐代有加。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与民国政府仍旧尊孔崇儒。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南京政府下令废爵，改封南北两宗宗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仍为世职。1946年，国民政府对幸存的孔氏南宗家庙建筑进行了修建，年仅6岁的孔祥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

孔子楷木像的辗转“逃亡”

据孔祥楷介绍，大宗南渡时，孔端友及族人恭负着传家珍宝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在孔氏子孙的心目中，孔子楷木像就像是孔先圣的化身，有着极高的神威和神力。1960年，孔子楷木像回归曲阜孔氏家庙。现在衢州孔氏家庙思鲁阁中的楷木像，是北宗奉送的复制品。

相传，孔子生前有弟子三千，去世后，弟子们悲痛不已，在孔子坟前守墓三年。三年后，唯有子贡不忍离去，在孔子墓前搭起茅屋，继续守了三年。这期间，他常常回忆老师生前的言行容貌，并砍来楷木，心思手摹，终于雕成了孔子和亓官夫人像。

据了解，这对楷木像高不满2尺，孔子长袍大袖，手捧朝笏；亓官夫人长裙垂地，形象生动。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前居室立为庙堂，当初仅有“茅屋三间”，孔子夫妇楷木像雕成后就供奉在这里，摆设条件非常简单。

根据民间传说，当年衍圣公孔端友背负两尊祖宗圣像率家人南渡，行至镇江码头，大家又饿又累，便上岸稍作休整。这时，金兵突然来袭，眼见楷木圣像将被金兵掳劫，大家正在束手无策之时，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把船只掀翻。金兵见此情景，以为船上的人都被巨浪卷走，便回马收兵而去。孔端友急命家人打捞楷木像，这时只见河面上有三位神人踏着祥云，拥着楷木像向岸边走来。孔端友和家人把圣像小心地护上岸，并在岸边焚香祷谢。这时，袅袅香烟中出现“鲁阜山神”四个字，原来是孔子故乡的山神救护圣像。后来，为了感谢故乡山神的功绩，孔端友及家人在衢州建立了“柯阳首庙”，即“三神庙”。

宋理宗三年，朝廷命建衢州孔氏家庙，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在此度过了27代860多年，仍然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就以南宗家庙来说，或改朝换代，或战火兵祸，就先后迁建过三次，每次都经受着被劫或被毁的险境，但孔子楷木像最终被完好地保护下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两次攻陷衢州，入侵衢州的日寇军官听说衢州孔氏家庙珍藏着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企图劫取这一稀世珍宝。当时的国民政府曾致电浙江省政府，令南宗奉祀官恭护圣像移驻龙泉、庆元山区。为掩敌耳目，孔氏后人密访能工巧匠仿制了一对赝品，奉祀官孔繁豪携带避至龙泉、庆元，而将真像密藏在衢州深山里。侵衢日军未能掠得孔子楷木像，大为恼火，劫掠庙内400多件珍器，还纵火烧毁孔庙藏书楼。抗战胜利后，孔子楷木真像重新珍藏在衢州孔氏家庙中，同时烧毁了赝品，以免日后鱼目混珠，真伪难分。

800多年的风雨斜阳、战火硝烟，衢州孔氏家庙的建制依然遵循着南渡时家庙的规制，并一直保留思鲁阁，表达着强烈的思乡之情……

·相关链接·

南孔祭典

□ 王红军 整理

祭孔始于汉朝，此后经历代传承延续，到明清时规模达到巅峰。《周礼·春官·宗伯下》说，冬日至，大司乐要在地上的圜丘奏乐，演奏六次，则天神降，可以礼神。

公元1128年冬至，宋高宗“亲祀天于圜丘”，孔子第48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及其叔父孔传陪祀。衍圣公为什么要奉诏侍祀呢？这要从北宋皇帝的尊孔崇儒活动说起。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面对藩镇割据背景下建立的新王朝，宋太祖在将兵权和财权收归中央的同时，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重文轻武政策，宋太宗赵光义更是“崇尚儒学”，宋真宗、宋仁宗也是乐此不疲。

据介绍，北宋的尊孔崇儒活动包括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圣化孔子。天圣年间，宋仁宗下诏改封“文宣公”为“衍圣公”。此后，孔子嫡系后裔爵号“衍圣公”沿袭800多年。再就是，提高拜谒孔子的礼仪规格。宋真宗时，不顾当时“肃揖”的规定，“特再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到宋仁宗时，就将宋真宗的这一做法制度化了。

1949年之前，孔子生辰农历8月27日是教师节，也是孔子的“秋祭”日。对此，旧时的报章上曾有记载，比如1947年9月6日《东南日报》载《南宗祀孔记》，具体叙述了孔氏南宗的由来、变迁，以及抗战时奉祀官孔繁豪护送楷木像赴龙泉、庆元避难等状，开头写道：“今年‘8·27’是先圣孔子的2498年祭。南宗奉祀官的执事早数天就开始忙了。因为奉祀官还是一个小孩子，事情便由其尊翁孔繁英和孔氏家庙理事会理事长孔宪洛负责主持。”

2004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5周年纪念日，衢州市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祭孔大典。孔子第75世嫡长孙孔祥楷确定了当代人祭孔的思路：“献五谷”代替了“献三牲”；银杏叶和古柏树叶系以黄丝带代替了贵宾佩戴的鲜花；着现代正装的市民代替了着古代服装的“演员”；改佾舞为朗诵《论语》章句；全场合唱《大同颂》，歌词是《礼记22大同篇》。

“我们要尽早把中国的优秀思想送到孩子的‘电脑硬盘’里去，先把空间占好，后面的思想就没法来抢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孔祥楷是极为看重的，“我有一次看上海的一份报纸，说有学校在教学生做披萨，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不教包饺子、裹粽子呢？”

“历朝历代都有祭孔，每个朝代的祭孔仪式都有时代烙印。”逢五逢十的年份，孔氏南宗家庙将举行大规模的社会公祭，余下的年份轮流举行国际儒学论坛和学祭。孔祥楷说：“祭孔的内容有三种，但形式是一样的，祭孔的主力还应该是老百姓。”

今年5月，以“当代人祭孔”和“百姓祭孔”为特色的南孔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张啸林之死

1940年8月14日，上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的张公馆，连续不断地传来几声枪响，随之而来的是女眷们惊慌失措的尖叫声和保镖的追喊声。一片混乱中，一名持枪男子被几名保镖拦腰抱住，只见男子毫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扔，振臂高呼：“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妄想独霸上海滩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共事变。当时，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一起组织了中华共进社，配合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纠察队。大批青帮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武器，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发起突然袭击，大批工人遭到屠杀。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之后，张啸林曾先后当上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上海华南纱布交易所监事等职务。然而，在张啸林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徒有其名的虚职，他真正想要的是掌有实权的大官。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打响。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防止“三大亨”的势力被日本人利用，蒋介石劝说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人一起去香港。

正当蒋介石部署撤退之时，张啸林却暗自盘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定要拉拢和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明确表示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而杜月笙又去了香港，这似乎正是他张啸林独霸上海滩的大好机会。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要投靠日本人。

大发汉奸财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本大特务土肥原通过曾经担任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与张啸林正式洽谈“合作”条件。张啸林提出要当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土肥原为引诱他早日上钩，爽快答应。心痒难熬的张啸林要李思浩尽快安排他和土肥原见上一面，以便把事情敲定。

与土肥原约见当日，张啸林和一帮保镖分乘三辆汽车前往位于虹口区的东湖旅社，途经外白渡桥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卡以没有收到命令为由，加以阻拦，迫使张啸林的车队在外白渡桥停了大半天，由此，张啸林去日租界的事情很快就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

这实际上是土肥原特意导演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将张啸林准备当汉奸的事公之于众，以影响上海的其他人士。张啸林的本意是要土肥原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出山，以抬高身价，土肥原没有赏他这个脸，而张啸林做官心切，只好移樽就教，驱车去见土肥原。此时的张大亨还以为自己踏上了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阶梯，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为他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然而，张啸林没有想到的是，日方已与汪精卫集团加强了勾结。与汪精卫之流相比，张啸林的利用价值自然要小得多，所以会见时，土肥原对官职一事只字不提，张啸林好处尚未到手，卖身投敌的企图却已路人皆知，心里好不懊丧。

张啸林虽然没有做成汉奸官，但却发了汉奸财。1939年前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困难，日本人找张啸林帮助解决物资短缺的难题，这正中了张啸林的下怀。

张啸林和他的亲家俞叶封一起公开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强行征购粮食、棉花、煤炭等军需用品，日本人因此而获得了大量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与此同时，巨额的法币、美钞也滚滚而来，流入了张啸林、俞叶封等人的荷包。

此外，张啸林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并布置手下，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捕杀爱国志士。正是如此这般肆无忌惮的投敌卖国行为为张大亨招来了杀身之祸，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早已盯上了他，一场腥风血雨的除奸行动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锄奸行动一波三折

随着张啸林叛国举动的愈演愈烈，国民党的不安与日俱增，除掉张啸林，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蒋介石亲自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上海区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此事由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分队长陈默负责具体策划和执行。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

1940年1月13日，行动组获悉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邀请他第二天去更新舞台包厢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啸林在包厢看戏之际对他下手。

行动那日晚上，军统的若干便衣特工早早地来到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就座，旁边就是俞叶封。特工们紧紧握着藏在怀里的手枪，伺机而动。

此时的张啸林对戏院里的情况毫不知情，集结了一干保镖正准备出门，他决不会想到，在戏院里等着他的不仅仅有一台好戏，还有几把蓄势待发的手枪。

正当演出进入高潮，观众如痴如醉之时，突然，一阵枪声响起，刹那间，楼上包厢内已有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没能去剧院看戏，只有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

一次暗杀不成，已然打草惊蛇。俞叶封被乱抢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这件事着实使张啸林心惊肉跳，吓得他一时不敢出门。然而，张啸林赌性难改，即使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然每天晚上要带上十余名保镖到大新公司五楼的赌场去赌博逍遥。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出身贫寒，父亲是个做木桶的工匠。青年时代的张啸林在杭州机房学织纺绸，后考入杭州武备学堂，又拜到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门下，从此在拱宸桥一带以敲诈赌博、鲜事打架为生。1912年，他结识大流氓季云卿，随其赴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门生。此后张啸林便广收门徒，扩充势力，逐渐成为了青帮头目之一，众多盗匪、歹徒、地痞、流氓均投其门下。1919年，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相互结为把兄弟，排行老二，三人被并称为“上海三大亨”。

“上海三大亨”(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行动组清楚地获知了这一情况，并且具体掌握了张啸林的行车路线。赌场完事后，路上必然要经过善钟路(今常熟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陈默决定就在这十字路口下手。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事先对红绿灯做了手脚，只要张啸林的车队一到，特务们就可以拉开红灯。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行动当日，军统在十字路口设下了埋伏。张啸林的车队出现在路口了，特工忙拉开红灯，司机见了红灯，被迫减速。埋伏在一旁的军统特工没等汽车完全停稳就一拥而上，对着汽车乱扫一气。张啸林的司机多年来跟他出生入死，经验很丰富，一见这种情况，立即猛踩油门，汽车冲了过去。车身虽然中了很多枪弹，但是张啸林却又逃过了一劫。

暗杀行动现转机

两次险些遭人暗算之后，张啸林开始足不出户，以静制动，导致军统特工对他束手无策，找不到任何下手的机会。陈默只好另找办法，动用内线。其实，第一次暗杀张啸林未成之后，陈默就已经在张啸林的周围找到了一个做内线的人选，并且以铲除汉奸的民族大义将他成功策反，此人便是林怀部。

接连遭人暗算，张啸林不得不加强守卫，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十分超群的保镖，于是，他的贴身司机王文虎向他推荐了林怀部。林怀部，山东人，其父曾在北洋军队当过团长，后因父死家贫，便到上海投考法租界的巡捕房，因为枪法精准，成了巡捕房的一名华捕，并拜张啸林的司机王文虎为“过房爷”。

此时的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但仍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动向，与戴笠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便利港沪两地的联络和通讯，杜月笙让一名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代理人，在上海设立了秘密电台。电台不仅使杜月笙能够时刻保持同上海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使军统指挥上海铁血锄奸的地下行动，如手使指，极其灵活。

张啸林与日本人打得火热之时，戴笠也曾经提示杜月笙要放弃兄弟情谊大义灭亲。但当时杜月笙没有明确表态。

当然，杜月笙也不是没有劝过张啸林，在去香港之前，他曾多次劝张啸林离开上海，无奈张啸林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并且执迷不悟地继续同日本人狼狈为奸，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身在家中被刺杀

此时的张啸林，处境已经十分危急，军统在他府中安插了内线，随时都会取他性命。杜月笙远在香港，眼看着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命悬一线，但民族大义当前自己又不能有所作为。此时的张啸林，自以为有了保镖和日本宪兵的保护就可以安枕无忧，完全不知道自己末日已近。

1940年8月14日，一辆汽车驶进了张宅大院，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张啸林的得意门生吴金桂，时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金桂一进门，就被管家迎上了楼。

张啸林和吴金桂相谈甚欢，突然从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吵到了张啸林的好兴致。他两步跨到阳台一看究竟，原来是林怀部在和司机吵架。

张啸林将半个身子探出阳台，冲着林怀部大骂，林怀部也毫不示弱，拔出了枪。林怀部一枪射中了张啸林，子弹从咽喉贯穿到后脑，张啸林还来不及惨叫一声，就已经鲜血淋淋地挂倒在了阳台上。

见此情形，一旁的吴金桂连忙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刚拨通号码，还来不及通话，就被赶到楼上的林怀部一枪击中后脑，吴金桂只得和他师傅张啸林一起踏上了黄泉路。林怀部又对着张啸林的尸体补了几枪，确信张啸林已死后才飞步出门，刚到门口，就被冲上楼来的几名保镖拦腰抱住，林怀部面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丢，振臂高喊：“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林怀部到案后声称他刺杀张啸林完全是出于一时激愤，与军统没有任何关系。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在他写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否认林怀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他说当时军统“上海区”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还是化名，从来没有林怀部这个人。

由于林怀部在被捕后不承认和军统的关系，法租界巡捕房一时无法“定罪”，也没将林怀部引渡给日伪。最后定为泄愤报复的普通刑事案，租界法院判了林怀部有期徒刑15年。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将他无罪释放。

然而，在陈恭澍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却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张啸林被杀后，陈恭澍曾经接到“第二大队”的书面报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由此可以说明，林怀部正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内线，林怀部的杀张锄奸行动也是由军统精心布置的。

张啸林一生都有一个做官的梦，但是一辈子也没当过官，最终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做官梦让他丧了命。因为一直没能和日本人达成协议，虽然他做了汉奸，但却没能当上一天汉奸官。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探索·发现